

相遇于遥远的天边

——在王元化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

胡晓明

我是1987年到上海来读书的，算来有二十一个年头了，有幸长期伴随了先生，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特别值得珍惜的缘分。这些年我几乎每月都去看先生，无话不谈，师生间情同父子。我讲一个细节：我对上海的道路，从金沙江路到高安路这一段最熟了。每一条岔路或小路上有什么小吃店、花店、书店都如数家珍。从骑车，到乘出租，到坐地铁，岁月如流，毕竟走了二十一年，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有机的一部分。现在，这个部分永远地消失了。

先生以及他的学生、朋友，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地离开。我原先以为，这样谈文论学的日子，可以过好好久久的。

人生中有的事情，因为太日常生活了，就不珍视了。这当中，除了有五年我记了日记，大半事情都已进入忘川，今天回想起来，竟也有往事如烟的感觉。



王元化先生和他的博士生。从左至右为吴琪幸、王元化、蒋述卓、陆晓光、胡晓明。

将来会慢慢整理出一些记忆，今天我讲有关先生思想性格的几件小事。

1995年，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选集《清园论学集》，在扉页上，他钤印了一枚闲章：“临风挥翰”，又题写了一段文字：“护封四字，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，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

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把“临风挥翰”与“咬定青山”这两个意思连在一块，让我很意外。我原来的理解里，“临风挥翰”是很有名士风度的，然而在先师那里，“临风”的意思，不是美学的小感觉和做人的诗意，而是大论述。是做学问的精神、意趣，一方面要感受四方之风，一方面又要以我为主，独立不倚。这里，有很高的立意。

这个故事最能表明先生性格。我跟先师多年的最重要体会之一，就是他做人做事非常肯定，绝不随便马虎，绝不轻易变化，十分顽强地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。他其实是最没有名士风度的一个人！大的方面，如人文主义者的生命尊严，如人文精神的有益人世，如知识人的自由与独立；小的方面，如人对人对事对书的看法，以至房间里的一件家具、书桌上的一本书、信封上的一枚邮票等的位置，他都执著认真得很。在一个最有八面来风的时间与地点，“咬定青山”而“临风挥翰”的形象，是十分典型的王元化形象。

另一件事情是，在离世前两天，他忽然专门托人把我叫去。躺在病床上，很艰难地嘱托，要我帮他转达学馆的负责人，在将来的学馆门口的石头上，写下下面一段现成的文字：

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：他们精力充沛，思想活跃，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。他们敢言，从不谨言谨行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，该批评就批评，该反对就反对，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“战士”或“先知”。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，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，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，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。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，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；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。他们是那种为思想、为观念而生的人，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。

我认为这正是他借着学术馆的设计，对自己所作的盖棺论定。既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，也不是广场上的檄文和革命的投枪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。这正是他最突出的特色。去医院的那天，我刚好从山东开会回来，因山东有人问起王元化90年代的所谓转向问题。我就问他，90年代为什么转向？他看了看我，只说了一句：我没有什么转向。这也是他的自我论定。我的理解是：第一，主观上，他从来不回避危险。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曾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，不承认是因为政治的压力，而从80年代撤退下来。第二，客观上，他不同意自己90

年代只是做纯学术。他真正推崇的是一种富于思想关怀的学术。只不过，生命格调由绚烂而平淡，学风可说是由“英锐”转而“沉潜”了。

先生沉思的精神生活中，背后又有很强的政治性。如何理解？先生也明确说过：“艺术即政治，这话虽然说得笼统，意思并不错。”又解释说：

从事学术课题的研究是很复杂的，往往有学术方面的思考；也有思想方面的思考；有历史方面的思考，也有当代方面的思考；有文化方面的思考，也有政治方面的思考等。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，交织在研究者的头脑中，在从事不同课题的研究时，有时会从这一方面出发，连及其他方面，有时也可能从那一方面出发，连及到其他方面。不论怎样变化，归根到底都是从学术本身引发出来，而不是外加给学术的。（《清园近作集·序》）

他在评价史华慈的学术风格时又说：

这种表述方式是基于思维方式而来的，它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；不是简单化的，而是错综复杂、头绪纷繁的。因此，这种隐奥的文笔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，是经历了沉潜往复、多面推敲、曲折进展的历程的。只有单线思维、不知怀疑、但求简明结论的人，永远不能理解史氏的表述方式以及体现这种表述方式的思维方式。（《致林同奇》，见《清园近作集》）

了解元化先生学与思的人，不难理解，他在说史华慈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所心仪、所坚持的学术精神，作了一种主张呢？他确实是在最八面来风的时间与地点，以复杂的头脑、具有张力的思考来对待学术的一个诚实的思者。

最后要说明的一件事情是，先生缠绵病榻的岁月里，最忧虑的，是文明的衰落：从全球化文化社会的越来越“铁笼化”，到国内人文精神迷失与知识人的犬儒化。他在《清园近作集》中，常常说起：“21世纪恐怕将是文化崩溃的时代。”“这样发展下去，真不知伊于胡底，今天已经到了这种文化危机的时候了。”“令人对中国文化的前景感到悲哀。”“我曾经进言，希望在上海能留一份可看的读物，但根本无效。”“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、物质主义为含义的普世理念蔓延而感到兴奋。”有一次先生对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看过《土敏土》？一定要看看，那本书很好。”需知，那本书是揭示出一般人们常常认为进步的国家与时代，隐藏在社会与历史肌体内部里的深刻悲剧的。我常常想，先生的晚年，其实有一

种很深的悲剧精神。我的眼前，总是不能忘记这样的一幅图像：

那一天，我很早去瑞金医院看他，只见他清晨梳洗完毕，静静坐在轮椅上，静静看着电视屏幕上激情又动荡的火炬传递情景，以及新闻评论员的评说。奇怪的是，电视机只有图像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我想，这种悲剧精神的存在，不仅表明他已经穿越了、透视了他的时代，当然也表明了他终不能忘情，终不能离开他的时代，终不能做一个学问上的自了汉。

夏中义写了一本《王元化襟怀解读》，其中引用到李义山的诗，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，来表彰先生的学问精神。我有一次问先生说，老夏这样说你，还是不好懂。学问里的自由江湖与人间世的现实天地，你在哪一边？先生简单说：“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”

李义山的这两句诗，我是这样讲的：

其一，在征途中，永远向往着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“江湖”。

其二，但是天要变、地要陷，不能不管，要回天救地。这正是先生那样的人特有的诗人气质。

其三，在遥远的天边，一切真实的心意、诚实的思考，都是可以真正的相遇的。

中国的人文精神，“人”在前面，“文”在后面。先生又回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。在那遥远的天边，先生，你听得到古往今来的回响么？

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于日就月将斋

附言：先师辞世后，上海社联与华东师大，曾召开了两次追思会。我将两次会上的发言稍加整理并作文字上的修订，合为此篇。林森教授与先师生前多有学术交往，先师在南大的那一次讲座，既是他的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的发布，也是他师生以道相和的美好体验之一。林森教授在《跨文化对话》上发起纪念先师的专刊，是义不容辞的学术职责，也是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的高情隆谊。蒙邀约稿，谨向林森教授及《跨文化对话》同人致以诚挚的谢意。